

冯天瑜·主编

人文論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CSSCI收录集刊

2014 年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冯天瑜 • 主编

人文論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CSSCI收录集刊

2014 年第一辑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论丛·2014年·第1辑/冯天瑜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161-5857-9

I. ①人… II. ①冯… III. ①社会科学—2014—丛刊 IV. 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398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 煄

特约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00 1/16

印 张 28.25

插 页 2

字 数 506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名单

学术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松山 瓦格纳 艾 兰 池田知久
刘纲纪 朱 雷 谷川道雄 李学勤
杜维明 庞 朴 宗福邦 饶宗颐
章开沅 谢和耐 裴锡圭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刘礼堂 李维武 陈文新
陈庆辉 陈 伟 陈 锋 吴根友
沈壮海 张建民 杨 华 杨逢彬
罗国祥 尚永亮 郭齐勇

主编 冯天瑜

副主编 郭齐勇 陈 锋 陈文新 杨 华

本期执行主编 陈文新

本期执行编辑 余来明

目 录

人文探寻

“五伦”“三纲”分梳	冯天瑜 (3)
中华人文精神的自觉与文明间的对话	郭齐勇 (15)
良知与良能	
——从孟子到王阳明	廖晓炜 (27)
儒家视野下政治正当性的三种进路	谢远笋 (44)
从《声无哀乐辨》对嵇康声论的批判中看黄道周的	
乐理乐教观	杨杰 (60)
胡寅对佛教在华传播的历史批判	
——兼论其排佛思想的两期发展	刘依平 (68)
禅宗色空观与宋元文人心态	任红敏 (80)

“三礼”研究

整理本《仪礼注疏》校点失误举例

——以《士冠礼》篇为例	吕友仁 李森 (93)
用在引经据典意义上的“礼”字如何标点之我见	
——以《汉书》、《三国志》、《新五代史》、《宋史》为例	李慧玲 (110)
康有为《大同书》与《礼运》的思想联系	林素英 (117)
从“明道”到“行道”	
——以嘉庆、道光年间文庙从祀为中心的考察	梁健聪 杨兆贵 (140)

明清经济社会与文化

- 自微见著：“天门岳口熊氏契约文书”初识 张建民 (153)
 试论晚清书刊的销售 王美英 (188)
 国家、社会与地方水利系统管理
 ——以明清鄱阳湖流域为中心 廖艳彬 (201)

历史文化语义学

- 中日间近代“伦理学”的厘定 聂长顺 (215)
 1866—1905年主要使西日记中议会文化之变迁 余冬林 (234)
 从“万国史”到“世界史” 缪 偕 (244)
 基督新教“天职”观的变迁 林纯洁 (254)

文学与语言

- 《珂雪斋诗注》序 陈文新 (269)
 文献·文学·文化
 ——元代文学研究三论 余来明 刘梦迪 (275)
 宋元话本与重叠式亲属称谓词的产生和发展 周 文 (287)
 论清阙名《江流记》传奇在“江流戏”传播史上的
 “承启”作用 赵毓龙 胡 胜 (300)
 论唐代前后期爱情传奇之嬗变 陈际斌 (310)
 从“杨志卖刀”看《水浒传》的象征叙事 郭皓政 (327)

近代文化

- 徐天闵教授和他的《古今诗选》 熊礼江 (341)
 科举废止前后晚清文人身份的构成及其衍化 顾瑞雪 (358)
 二十世纪以来书院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刘莉莎 (377)

书评与综述

为有源头活水来

- 冯天瑜教授《天光云影》书阅后 孙疏影 (389)
两个世纪的《儒林外史》研究述评 鲁小俊 (395)
2000—2013 年类书研究综述 司马朝军 王献松 (416)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大事记

- (2013 年 1—12 月) 李小花 (437)

人文探寻

“五伦”“三纲”分梳

冯天瑜*

扬弃 (aufheben)，指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既抛弃又保留、既克服又继承的关系。康德首先运用该词。黑格尔赋予这一概念以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含义，认为概念发展的每一阶段对前一阶段而言，都是一种否定，这是包含肯定的否定，概念的发展过程，对旧质既有抛弃又有保留、既有克服又有继承。扬弃包括发展和联系两个环节。联系的环节体现了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发扬、保留和继承，这是“扬”的过程，是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发展的环节体现了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抛弃、克服，这是“弃”的过程，是事物发展中的非连续性。对文化遗产须加扬弃，实现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

国学即国故之学，指中国传统学术，其包蕴丰富，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今日讲习国学，须作辨析，扬其当扬，弃其当弃。这是倡导国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国学由“国文”、“国史”、“国伦”组成，对三者皆须扬弃，不能囫囵吞枣。而“国伦”即中国式伦常，是国学的核心内容，尤当深入辨析。

陈寅恪（1890—1969）将中国伦常的精神内核概括为“三纲六纪”，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 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

* 冯天瑜，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

纲纪说被视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是对各组伦常关系的顶层设计，如遇到李煜这样孱弱的君主，则期之以刘秀那样英明的君主；遇到卖友的郦寄，则期之以鲍叔牙那样忠诚的朋友。

陈先生承袭两汉以来的纲常说，将“三纲”与“五伦”^[1]一体论之，一并推尊为人伦准则的极境；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将“三纲五常”视作吃人旧礼教，加以整体摒弃。其实，无论肯定还是否定，将“三纲”与“五伦”捆绑在一起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思想史实际。置之概念生成史考察，“三纲说”与“五伦说”虽然都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宗法观念的表现，有着相通性，但二者的主旨和成说时期皆颇有差异，分别代表中国伦常观念的两种走势，不宜笼统处置，应当予以分梳，区别对待。

一 伦理观的两种旨趣

宗法社会的人伦观，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单向独断论和双向协调论两种系统，形成两个旨趣不同的传统。传统之一以“三纲说”为代表，传统之二以“五伦说”为代表。

（一）“三纲说”强调上下尊卑的威权性、绝对性

“三纲”一语首出西汉大儒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他将“王道”的要领概括为规范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说”，并认为这些规范是天道决定的。董氏曰：

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2]

又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3]，王道三纲是颠扑不破的永恒法则。

“三纲说”完整的表述，见之于汉代纬书《礼纬·含文嘉》，班固（公元32—92）《白虎通》卷八《三纲六纪》说：

[1] “五伦”或指仁、义、礼、智、信五种德目，或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伦常关系，本书取后义。

[2] 《春秋繁露·基义》。

[3] 董仲舒：《贤良对策三》。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

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

两汉时期的董仲舒、班固肯定上下尊卑秩序，却并未着力强调上对下权威的绝对性。而早在战国末期，力倡君本位的法家韩非子（公元前280—前233）说：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
此天下之常道也。

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1]

韩非子强调的是下对上的“事”和“顺”，即无条件服从，并激烈批评《尚书》、《周易》讴歌的尧舜禅让、汤武革命，认为尧舜汤武所为，是“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韩非子主张，“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2]。将君对臣、父对子的威权提升到绝对程度，还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

韩非子坚称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常道”，即“秦制”君主集权的社会制度原则，又演变为两汉以降“三纲说”的基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意见，核心是“王道三纲”说，强调君父威权，成为宗法专制君主时代的主流意识。唐代大儒韩愈（768—824）在名篇《原道》论及君、臣、民关系时，阐发的是上对下、尊对卑的垂直控制：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

[1] 《韩非子·忠孝篇》。

[2] 同上。

[3] 《韩非子·扬权》。

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与君主专制相伴生的“王道三纲”说，贯穿汉唐至明清，当近代民权运动兴起，此说仍是强势的抗拒惯性。戊戌变法之际，张之洞（1837—1909）著《劝学篇》，其内篇称：

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1]

足见“三纲说”作为单向独断论的绝对主义伦理观念，构成专制政治的伦理基础，抵制民主、平权诉求。

（二）“五伦说”讲究人伦关系的相对性、和谐性

传统伦理的另一宗旨则见于“五伦说”，即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所谓：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

其间包含着人际间的温馨、理解和信任，发乎人伦骨肉之情，而且是相对性的、双向性的要求。这种“五伦说”集中反映在《尚书》、《左传》、《孟子》、《老子》等先秦典籍的民本主义表述中。

简言之，民本主义的上下关系论要领有二：

第一，下是上的基础，民众是立国根本。

《尚书》的“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3] 是此一精义的著名表述。老子从贵与贱、高与下的辩证关系立论：“故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穀，是以贱为本也。”^[4] 正是从这种下是上的基础，民众是立国根本的认识出发，孟子发出千古名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

第二，民意即天意，民心即圣心。

[1] 张之洞：《劝学篇·明纲》。

[2] 《孟子·滕文公上》。

[3] 《尚书·五子之歌》。

[4] 《老子·三十九》。

[5] 《孟子·尽心下》。

《尚书》载周武王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尚书》又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2]老子则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3]

以君臣一伦而言，“五伦说”对君与臣两方面都提出要求，如孟子指出：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4]

荀子说法相类：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5]

民本主义者的一个经常性论题，是“爱民”、“利民”，反对“虐民”、“残民”。孟子反复劝导国君“保民而王”^[6]，荀子则有警句：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7]

八百载后，唐太宗与魏徵君臣对中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8]的名论承袭于此。

至于夫妇一伦，“五伦说”则以“义”为标准，“夫妇以义事，义绝而离之”^[9]，“夫不义，则妇不顺矣”^[10]。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双向性要求。

在父子一伦上，主张“父慈子孝”，双向要求。

在兄弟关系上，主张“兄友弟恭”，也是双向要求。

朋友关系则讲究互利互助，“交友之旨无他，彼有善长于我，则我效之；我有善长于彼，则我教之。是学即教，教即学，互相资矣”^[11]，倡导朋

[1] 《尚书·泰誓》。

[2] 《尚书·皋陶谟》。

[3] 《老子·四十九》。

[4] 《孟子·离娄下》。

[5] 《荀子·大略》。

[6] 《孟子·梁惠王上》。

[7] 《荀子·王制》。

[8] 《贞观政要》。

[9] 司马光：《家范·夫妇》。

[10] 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

[11] 王肯堂：《交友》。

友间互相取长补短，推崇的仍然是双向互济关系。

梁启超（1873—1929）慧眼卓识，将“五伦”的精义称为“相人偶”，也即人际间对偶关系的相敬互助。他指出：

五伦全成立于相互对等关系之上，实即“相人偶”的五种方式。故《礼运》从五之偶言之，亦谓之“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人格先从直接交涉者体验起，同情心先从最亲近者发动起，是之谓伦理。^[1]

这种对人际间在权利与义务两方面提出双向互助性要求，以形成较为和谐的人伦关系，在利益驱动的现代社会尤其显得宝贵与急需。20世纪下半叶，东亚国家或地区创造经济奇迹，除利用最新科技成就，借用西方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激励机制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伦理的人际和谐精神得到现代式发挥，将企业和社会组合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命运共同体”，使管理者与劳作者在“和”的精神凝聚之下，形成长久、牢固的“合力”，而不是短暂的利用关系。这正是对东亚和合精义的创造性发挥，暗合了孟子的名论——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

也暗合了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的名论——

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3]

与佛教的“丛林共住精神”也彼此契合——在管理架构上“各守其分，各尽其职”；在生活上，以众靠众，实践互敬互勉、无诤共住的和合僧团精神，共同遵守“六和敬”——

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见和同解。

[1]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第9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5页。

[2] 《孟子·公孙丑下》。

[3] 《荀子·王霸》。

此皆为可久可大的和谐之道。

二 “五伦说”先于“三纲说”

“三纲说”与“五伦说”旨趣各异，且其生成机制、成说时代，有性质之差、先后之别。

(一) “五伦说”成于分权的封建时代

大体言之，“五伦说”形成于先秦，是宗法封建时代（本义上的“封建”，而非泛化的“封建”）的产物，较多地保留了氏族民主遗存和封建分权之义，蕴蓄着血亲温情，讲究的是“情理”。成书战国的《左传》、《礼记》皆倡导双向互动的人伦关系：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1]

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2]

对尊卑双方均提出要求，双方协和才是“礼”的要旨。

先秦哲人普遍认为下对上既当顺从，也应批评，臣子谏议君父，是忠孝的表现。

春秋末曾子（公元前 505—前 436）主张子对父“微谏不倦”（不倦地提出温和有度的批评）。^[3]

战国初期子思（公元前 483—前 402）说：

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4]

战国中期孟子主张臣子“格君心之非”，即批评君父的不是之处：

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1]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2] 《礼记·礼运》。

[3] 《孝经》。

[4] 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

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1]

战国后期荀子强调敬重君王，但仍把谏君之非列为忠，不过是“下忠”：

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2]

荀子高度赞扬谏君之臣：

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3]

逆命而利君谓之忠。^[4]

先秦哲人普遍认为，道义是人伦的最高准则，忠孝皆在“道”的覆盖之下，所谓：

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5]

《左传》肯定晏婴（？—前500）的“不死君难”说（不为暴君昏君当殉葬品）。^[6]

汉人赵岐诠释《孟子》，有一切关紧要的辨正：

于礼有不孝者三，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

认为第一不孝，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即对父母无条件地屈从，容忍他们做不义之事。“不娶无子”，只是第三位的不孝。孟子的思想体系是仁义至上（所谓“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赵岐将“陷亲不义”列为不孝之首，庶几合乎孟子思想主旨。

[1] 《孟子·离娄上》。

[2] 《荀子·臣道》。

[3] 同上。

[4] 同上。

[5] 《荀子·子道》。

[6] 详见刘向：《说苑·卷二·臣术》。